

# 如此君臣：清世宗與年羹堯 君臣關係及其形象流變

吳佩樺\*

清世祖曾以《御定人臣儆心錄》訓誡群臣，昭示為臣者應當遵循的規範，降至雍正朝，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幕客汪景祺卻著〈功臣不可為〉一文，質疑君主的權威，替功臣發不平之鳴。文中所謂「位極人臣」者，或有意暗指年羹堯本人。權傾一時的年羹堯，對君臣倫理構成衝擊與挑戰，清世宗則力圖透過形象塑造，重新導正秩序，更使一切懲治年羹堯的舉措名正言順。身為皇帝，清世宗固能懲辦年羹堯或任何一名官員，能主導正史評價的走向，但當世殊事異，隨著時局變化，野史傳聞中的君臣形象，終究出現意想不到的發展。

本文藉由年羹堯勢盛、議罪和後世流傳三個時期的君臣關係與形象變遷，探究幕後潛在的皇權運作，以及「君」與「臣」牢不可破的身分間隔，是否曾跨越常軌，最終如汪景祺所言，致使「君臣兩負」，並在百餘年後仍餘波盪漾。

**關鍵詞：**清世宗、年羹堯、君臣關係、君臣倫理、形象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 一、前言

清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中旬，漢官陳名夏（1601-1654）捲入朝政鬥爭，被判處絞刑。案情雖牽涉複雜，清世祖（福臨，1638-1661，1643-1661在位）僅簡單以「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斥之。<sup>1</sup>相較於關外時期，自清世祖訂立「崇儒重道」基本國策以來，<sup>2</sup>君臣分際逐漸擴大，君主不僅強調為人臣者應盡本分，更要使臣子時時戒慎恭謹，由是而能君臣相得，即《禮記·禮運》所言：「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sup>3</sup>清世祖欲以陳名夏等人下場訓誡群臣，依循明辨等差的儒家禮法，確立君臣相處適當軌範。

隔年（1655），清世祖命大學士王永吉（1600-1659）纂修《御定人臣儆心錄》，親撰序文，昭示全書中心思想，曰：

一於國則忘其家，一於君則忘其身，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允賴之矣。若夫奸邪之流，樹黨營私，怙權亂政，卒至身名俱喪，為國厲階。……恐後之為臣者或仍蹈覆轍，負主恩而渝素志，至於身罹刑憲，悔悼無由，故推原情狀而論列之，錄成一編，以為人臣儆心之訓云。<sup>4</sup>

<sup>1</sup> 王永吉奉敕編，《御定人臣儆心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御製序〉，頁2。

<sup>2</sup> 「國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設立學宮，令士子讀書，各治一經，選為生員，歲試、科試入學肄業。朝廷復其身，有司接以禮，培養教化，貢明經，舉孝廉，成進士，何其重也。」見《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第2冊，卷74，頁877，順治十年癸巳四月甲寅條。

<sup>3</sup> 鄭玄注，孔穎達疏，阮元校，《禮記正義》，收入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冊，頁1418。

<sup>4</sup> 王永吉奉敕編，《御定人臣儆心錄》，〈御製序〉，頁1-2。

全書分為八篇，包括：〈植黨〉、〈好名〉、〈營私〉、〈徇利〉、〈驕志〉、〈作偽〉、〈附勢〉和〈曠官〉，皆自古人臣易犯之過。如〈驕志論〉言君主權勢獨尊，尚且兢兢業業；人臣反逞其驕志，大不可取。建功立業只是人臣分內之事，若恃功、恃才、恃權而驕，清世祖不免感嘆：「獨不念人主專望優待之意謂何，而忍負之耶？」<sup>5</sup>

降至雍正朝，《御定人臣儆心錄》的核心價值卻受到了挑戰。初為國子監生員，後登康熙五十三年（1714）甲午科舉人的汪景祺（1672-1726），在〈功臣不可為〉一文中，開篇即提出質疑，曰：「或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弭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sup>6</sup>功臣為國奮不顧身，十分艱苦，最後若不得善終，問題根源必出於君主。汪景祺認為：

舉酬勳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何所苦而反乎？橫加猜疑，致成嫌隙，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撫馭乖方，君臣兩負。嗚呼！千古之豪傑英雄所為槌心而泣血者也。<sup>7</sup>

功臣本無反心，但君主才能平庸，最忌功高震主，故「疑也，畏也，怒也，厭也」，<sup>8</sup>大改初衷，對功臣冤枉構陷。汪景祺此論，以人臣立場出發，為功臣發不平之鳴，與《御定人臣儆心錄》針鋒相對。

<sup>5</sup> 王永吉奉敕編，《御定人臣儆心錄》，〈驕志論〉，頁11。

<sup>6</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功臣不可為〉，頁965。

<sup>7</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功臣不可為〉，頁966。

<sup>8</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功臣不可為〉，頁967。

《西征隨筆·功臣不可為》寫於雍正二年（1724）三月，時汪景祺在陝西，擔任撫遠大將軍年羹堯（1679-1726）幕客。雍正三年（1726）十二月，隨著年羹堯定罪賜死，汪景祺被視為黨羽，以大逆不道之罪，判處立斬梟示。《西征隨筆》著作的背景與下場，既與「功臣」年羹堯關係密切，文中所謂「位極人臣」者，或有意暗指年羹堯本人。《御定人臣儆心錄》昭示的理想君臣規範受到衝擊，清世宗則力圖透過形象塑造，重新導正秩序。然而，「形象」出於主觀，當世殊事異，皇帝所主導的君臣形象亦不免發生流變。

本文藉由年羹堯勢盛、議罪和後世流傳三個時期的君臣關係與形象變遷，探究幕後潛在的皇權運作，以及「君」與「臣」牢不可破的身分間隔，是否曾跨越常軌，最終如汪景祺所言，致使「君臣兩負」，並在百餘年後仍餘波盪漾。

## 二、知遇榜樣：年羹堯勢盛時期的君臣形象

年羹堯與清世宗（胤禛，1678-1735，1722-1735 在位）有姻親關係，<sup>9</sup>是清代疆臣中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雖以「撫遠大將軍」的武功聞名史冊，卻是進士出身，歷任鄉試主考、內閣學士等文職。康熙五十七年（1718），清聖祖（玄燁，1654-1722，1661-1722 在位）欣賞年羹堯之才，曰：「自軍興以來辦事明敏，又能度量西去追勦之兵，運餉接濟甚屬可嘉」，<sup>10</sup>乃委以軍務。清世宗即位後，命年羹堯接替十四阿哥允禵（1688-1755），掌理西北軍事大權。

雍正元年（1723）十月，時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兵至西寧，特授撫遠大將軍。隔年二月青海平定，十月回京覲見，得清世宗賞

<sup>9</sup> 清世宗即位前，年羹堯之妹為其側福晉，即位冊封貴妃，後晉為皇貴妃。

<sup>10</sup> 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第4冊，卷32，〈年羹堯列傳〉，頁765。

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及金幣」，<sup>11</sup>封一等公，其子一等男世襲，在在顯示年羹堯榮寵已極，權勢達於全盛。在上諭、硃批奏摺等處，這種君臣知遇、彼此情深義重的形象更發揮得淋漓盡致。

### （一）當事人的記述

雍正二年青海平定後，清世宗以諭旨推崇年羹堯的軍功，並藉此表明心跡：

你此番心行，朕寔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立功不必言矣，當正西寧危急之時，即一摺一字，恐朕心煩驚駭，委曲設法，間以閑字。

尔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每向怡（怡親王允祥）、舊（應為「舅」，即隆科多），朕皆落泪告之，種種亦難盡述。揔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曉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蒼如是應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無因而來者也，朕寔慶幸之至。……此皆尔忠誠所致，寔賴尔之力也。我君臣惟將此一心，對越天地，以邀永永如是如是之福庇耳。可喜！可喜！可喜！可喜！<sup>12</sup>

這則極富代表性，且被馮爾康評為「不倫不類，話也讓人聽了肉麻」的諭旨，<sup>13</sup>具體展現出年羹堯在皇帝心中的特殊地位。清世宗

---

<sup>11</sup> 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第4冊，卷32，〈年羹堯列傳〉，頁787-788。在此之前，團龍補服未曾賜與外姓。

<sup>12</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第3冊，〈諭大將軍年羹堯西海軍功全賴爾之忠誠〉，頁12-13。

<sup>13</sup> 馮爾康，《雍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103。

將青海軍功盡歸年羹堯忠誠所致，卻非列舉實例立論，亦無條分縷析，只是透過情感抒發，意將君臣相得之情上應天地。文末連呼「可喜」，既是清世宗性格的反映，更表明此時君臣相處甚為融洽，關係親密，賞賜官爵盡加一身，放任其人掌握邊疆軍政要務。

同年三月，清世宗有硃批云：

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爾之慶幸，固不必言矣，朕之欣喜，亦莫可比倫。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sup>14</sup>

所謂「君臣一心」，實有更明確的指向：君臣之所以情深義重，肇因於君明臣賢，各安其位。若說年羹堯有如千里良駒，清世宗就是相馬的伯樂，惟伯樂能辨千里馬，惟清世宗能識賢臣，君臣知遇的理想形象於焉完成。在清世宗心目中，年羹堯建功愈多，愈加彰顯皇帝知人善任的聖君風範。

然而，即便在年羹堯勢盛時期，皇帝的讚譽也並非全無保留。清世宗稱許年羹堯青海軍功，則謂：

大將軍年羹堯秉性忠誠，持躬謙慎。茲者平定青海，迅奏膚功，雖方略由朕指授，而揆度機宜，調遣將士，決勝於旬日之間，宣威於萬里之外，使烽煙盡熄，邊塞永寧者，實年羹堯之力也。<sup>15</sup>

<sup>14</sup> 太保公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奏謝自鳴表摺〉，雍正二年三月十八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下冊，頁857。

<sup>15</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言下之意，年羹堯能夠迅速平定青海，「方略由朕指授」是重要條件。因此，身為「功臣」的年羹堯，也必須是「忠臣」，他的謀略與決策，理應視為皇帝意志的延伸。只有年羹堯權勢依附於皇權之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才能延續不墜。

對於皇帝的寵信，年羹堯在奏摺中屢次表達感激之情，甚至捧讀諭旨，「不自知其淚之如湧泉也。自今以往，臣有一日一事不愛養精神，仰助太平之治，便是辜負聖恩。」<sup>16</sup>另如清世宗以驛遞欽賜鮮荔枝，年羹堯具摺謝恩，曰：

臣叩頭祇領，伏念非分之榮，人臣固已罕觀，而心依北闕，不能一日釋然者。忽覩聖躬服用之物，心往神馳，安得身生兩翼，奮飛御座之前，少伸孺慕微忱耶！臣於此際感激瞻戀，莫知所云。<sup>17</sup>

言詞始終恭謹，感激皇恩浩蕩、誓不辜負，全然符合清世宗關於君明臣賢的想像。清世宗能在中秋時節以「但願人常好，千里共嬋娟」詩句贈之，<sup>18</sup>年羹堯能以「臣惟心仰祝，從此人長好，萬里共嬋娟，如是足矣」回應，<sup>19</sup>可看出君臣情誼深厚，確實達到「人

---

社，1999），第1冊，頁100，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奏事員外郎張文彬等捧出硃筆上諭九卿等。

<sup>16</sup> 太保公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謝賜西洋規矩並請入覲摺〉，雍正二年六月廿五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60。

<sup>17</sup> 太保公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謝賜荔枝摺〉，雍正二年七月十八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61。

<sup>18</sup> 太保公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謝賜御書詞扇摺〉，雍正二年七月廿五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61。

<sup>19</sup> 太保公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謝賜中秋餅果摺〉，雍正二年八月十五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61。

臣固已罕觀」的極致。

## （二）見證者的記述

雍正二年四月，汪景祺從河北邢臺出發，來到陝西，面見一位「宇宙之第一偉人」。<sup>20</sup>他以欽敬仰慕的心情，記載此人：

以翼為明聽之才，當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  
交孚而際會風雲，封爵則河山帶礪，榮膺九命，禮絕百僚。  
凡心知血氣之倫，無不傳明良為盛事。<sup>21</sup>

汪景祺見到的是坐鎮西海、權勢正盛的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這部錦上添花的《西征隨筆》，極盡頌揚之能事，甚至用「燕詞敬賦從軍樂，欲謁千秋第一人」，<sup>22</sup>描述會見年羹堯的心境。遠在京師的清世宗大約料想不到，君王尚在，竟有臣子能居「千秋第一人」之位。

汪景祺詩作還有「揮毫密進籌邊策，攬轡長驅靖塞氛。一自我公壇拜後，西陲萬里事耘耕」等句，<sup>23</sup>稱許平定青海是年羹堯一人之功。自言指授方略的清世宗消失了，年羹堯形象不僅是功臣，更脫離對皇權的依附，頗有指點天下之勢。至於清世宗的形象，

<sup>20</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頁900。

<sup>21</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頁898。

<sup>22</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頁902。

<sup>23</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頁901。

只剩「聞道千官陪綵仗，君王親待捷書來」，<sup>24</sup>如背景一般次要的陪襯角色。

另一位以文獲罪的士人錢名世（1660-1730），與年羹堯鄉試同年，曾作詩相贈，謂「鼎鐘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sup>25</sup>將年羹堯與清聖祖相提並論。士人存有趨炎附勢之心，發為諛詞並不罕見，但汪景祺等人敢將年羹堯地位抬高至當朝皇帝之上，足見年羹堯雖為人臣，實已「震主」，和他在奏摺中呈現出的形象判若兩人。

相較於這些文人，高官重臣對年羹堯的態度，受皇帝影響更深，也更需要時時在意皇帝的觀感。雲貴總督高其倬（1676-1738）於雍正二年二月奉旨推薦巡撫、布政司人選，文中並無任何與年羹堯相關的內容，清世宗卻忽然有感而發，硃批道：「天下督撫待朕之真，倚朕之切切者，除年羹堯外，諾敏為第一。」<sup>26</sup>可見清世宗以年羹堯為天下督撫的模範。

清世宗命群臣竭力效法年羹堯，當有官員表示「才智限於天分，實所不能強及」時，<sup>27</sup>清世宗回答：「命爾效法者此心也。才力猶可，此心難，莫看易了。」<sup>28</sup>此時年羹堯戰功彪炳，皇帝命群臣效法之，卻不強調效法其人軍事才能或奮勇殺敵之威，而是一

<sup>24</sup>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秦中凱歌十三首〉，頁970。

<sup>25</sup> 蕭爽，《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4，頁274。

<sup>26</sup> 雲貴總督高其倬，〈奏為遵旨謹奏事〉，雍正二年二月廿九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頁362。

<sup>27</sup> 署甘肅巡撫事布政使傅德，〈奏為敬聆聖晦恭謝天恩事〉，雍正二年六月廿一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冊，頁780。

<sup>28</sup> 署甘肅巡撫事布政使傅德，〈奏為敬聆聖晦恭謝天恩事〉，雍正二年六月廿一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冊，頁780。

片赤忱忠心。

無論法其心或法其才，年羹堯確實在清世宗刻意營造下，發揮楷模的作用，如高其倬奏稱：

一切緊要軍機事務，商量得及者，臣務必先商之大將軍年羹堯，酌妥然後舉行。有商不及者，辦理之後務必通知，不敢稍萌爭競之心，亦不敢推諉誤事。再臣與年羹堯彼此相好，臣實自知才識遠不能及，毫無競心。<sup>29</sup>

高其倬與年羹堯同為總督，卻要事事請教，宛如上、下級，年羹堯在朝中地位可見一斑。

由於清世宗強調「君明臣賢」不可分割，年羹堯成為群臣模範，皇帝的聖明形象也同時確立。朝中如清世宗所期待，出現「惟我皇上睿哲知人，推心善任；大將軍膽略嚴明，寬信敏惠」一類論調。<sup>30</sup>

### （三）皇帝態度的轉變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清世宗召集諸王、群臣，藉由十三日聖祖忌辰抒發感慨：當年身為皇子，尚不知君主至難、至苦之處；如今自為人君，艱難豈為群臣所知？不僅君主，為人臣者亦屬同理，不在其位，萬萬不能體會，是謂「為君難，為臣亦不易」。<sup>31</sup>

<sup>29</sup> 雲貴總督高其倬，〈奏為奏聞事〉，雍正二年二月廿九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冊，頁362。

<sup>30</sup> 署甘肅巡撫事布政使傅德，〈奏為敬聆聖晦恭謝天恩事〉，雍正二年六月廿一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冊，頁779。

<sup>31</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05，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諭曰。

諭曰：

近日賞兵，則相與謠言曰：「此大將軍年羹堯所請也。」  
夫朕豈幼沖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羹堯強為  
陳奏，而有是舉乎？此不過欲設計以陷年羹堯耳。<sup>32</sup>

此時，年羹堯盛寵未衰，清世宗代為闢謠。諭中繼而提及懲辦阿  
靈阿（?-1716）與揆敘（1674-1717）的諭旨，實乃皇帝真知灼見，卻  
又有人懷疑是由年羹堯指點，清世宗難免流露出滿之意：

朕之年長於年羹堯，朕胸中光明洞達，萬機庶務無不洞燭  
其隱微。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  
之聰明才智乎？<sup>33</sup>

「恩威賞罰非自朕出」，<sup>34</sup>無疑觸犯了皇帝的大忌。即便謠言  
皆為假造構陷，試問為何不說其他官員左右聖意，而獨獨歸於年  
羹堯？清世宗表面上未加追究，語中卻隱含警示，「君明臣賢」的  
君臣倫理受到威脅，皇帝心生芥蒂，重新思考關於君臣分際的問  
題。十二月，清世宗發給年羹堯的硃批有「倚功造過，必致返恩  
為仇」等語，<sup>35</sup>警告之意已甚明顯。

<sup>32</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07，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諭曰。

<sup>3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08，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諭曰。

<sup>34</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08，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諭曰。

<sup>35</sup> 太保公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奏報抵署日期並謝蒙陞見摺〉，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63。

雍正三年元月，從京師返回駐地的年羹堯參劾四川巡撫蔡珽（?-1743），清世宗起初「聞羹堯劾之，降旨詰責再三」，<sup>36</sup>但蔡珽被判死罪，清世宗又發覺「珽所犯應如律，然劾之者年羹堯也。論死，人將謂朕以羹堯故殺珽，是羹堯得操威福柄也。不可，其免珽罪。」<sup>37</sup>清世宗欲挫年羹堯之銳氣，故雖認為蔡珽有罪，最後仍予以赦免。事至於此，君臣嫌隙浮上檯面，逐漸加深，皇帝從前親口許諾的「千古君臣知遇榜樣」，終將幻滅。

### 三、背負君恩：年羹堯議罪時期的君臣形象

清世宗曾稱許年羹堯「從未自陳其能，向人亦無矜誇之色。此等功勳器量，求之古名臣中，亦不多見」，<sup>38</sup>但到了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堯奏摺誤將「朝乾夕惕」寫作「夕陽朝乾」，或屬無心之過，清世宗卻立刻斥為「自恃己功，顯露其不敬之意」。<sup>39</sup>兩段引文相隔僅四月有餘，評價竟完全倒轉，若非年羹堯忽從謙遜變為倨傲，即是清世宗本人心態發生變化。

<sup>36</sup> 〈大臣畫一傳檔正編·蔡珽列傳〉，收入清國史館編，《清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嘉業堂鈔本影印），第6冊，卷96，頁158。

<sup>37</sup> 〈大臣畫一傳檔正編·蔡珽列傳〉，收入清國史館編，《清國史》，第6冊，卷96，頁158。此事亦見《滿名臣傳·年羹堯列傳》，文句稍有不同，皇帝的意思更為明確：「蔡珽係年羹堯參奏，若置之於法，人必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年羹堯操持權柄太過，為清世宗所不容。見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第4冊，卷32，〈年羹堯列傳〉，頁790。

<sup>38</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00，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奏事員外郎張文彬等捧出硃筆上諭九卿等。

<sup>39</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19，雍正三年三月廿三日，川陝總督年羹堯兩江總督查弼納署理江寧巡撫何天培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各具本奏賀奉。上諭。

年羹堯早在雍正二年二月即已平定青海，若等到一年後，才忽然恃功而驕，頗不合常理，可推知實為年羹堯進京陛見之時，因權柄大顯，遭皇帝猜忌，終至無法繼續容忍，故而態度轉變。<sup>40</sup>雍正三年四月，清世宗不惜否定自己曾致力經營的「君明臣賢」形象，以妄舉胡期恆、妄參金南瑛、巧飾欺瞞、隱匿災荒等「昏聩」之罪，<sup>41</sup>將年羹堯降調杭州將軍，至十月鎖拏來京，十二月定罪賜死。期間，大小官員接連上奏，參劾年羹堯各項罪名。

清世宗雖為一國之君，無論賞罰黜陟，冠冕堂皇的理由仍不可或缺，以免聖德有虧，落人口實。因此，皇帝在懲辦年羹堯同時，亟需塑造年羹堯負面的形象，使一切舉措名正言順，是謂「天下後世，朕先站一個是字」。<sup>42</sup>

### （一）年羹堯的自白

年羹堯降調杭州將軍後，曾上摺謝恩，自言久病未復，感念皇帝「曲賜保全，既免貽誤於封疆，臣亦得因事簡而調治」。<sup>43</sup>但清世宗顯然無法釋懷，在硃批中表示：

朕聞得早有謠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之語。

<sup>40</sup> 馮爾康與楊啟樵皆認為年羹堯入京陛見期間為清世宗態度轉變的關鍵。皇帝親眼見證一名大臣如何權勢逼人，甚至侵奪皇帝恩威，已忍無可忍。見馮爾康，《雍正傳》，頁109。另參考楊啟樵，〈清世宗與年羹堯的恩怨輾轉〉，收入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81-85。皇帝既已「疑也，畏也，怒也，厭也」，年羹堯必遭懲治。參考陳捷先，〈年羹堯死因探微〉，《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臺南，1975.7），頁109-121。

<sup>41</sup> 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第4冊，卷32，〈年羹堯列傳〉，頁791。

<sup>42</sup> 杭州將軍年羹堯，〈奏謝調補杭州將軍摺〉，雍正三年四月廿二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74。

<sup>43</sup> 杭州將軍年羹堯，〈奏謝調補杭州將軍摺〉，雍正三年四月廿二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74。

朕今用你此任，況你亦奏過浙省觀象之論，朕想你若自稱帝號，乃天定數也，朕亦難挽。……看此光景，你並不知感悔。上蒼在上，朕若負你，天誅地滅；你若負朕，不知上蒼如何發落你也。<sup>44</sup>

清世宗發誓不負功臣，卻仍懷疑年羹堯有稱帝野心，心態十分矛盾，嫌隙至此再難挽回。<sup>45</sup>年羹堯已察覺形勢不利於己，自陳：「伏地鳴咽，不能起立」，<sup>46</sup>慚愧、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並向皇帝發誓道：

使千秋後世知聖主之於臣子，即昏憤如羹堯者，亦必化誨裁成，保全到底。

此臣之所以心悅誠服，感激之外無他念也。若敢口是心非，則天地之所誅滅。<sup>47</sup>

年羹堯尚未啟程赴杭，便先稱病告假，一方面極力自我辯白，更意圖告訴皇帝，若能保全其性命，不啻成全雙方聖君賢臣之名，可惜並未得到期盼的回應。

五月中旬，岳鍾琪（1686-1754）至西安接替年羹堯職務，兩人會面時，曾有一番戲劇性的談話：

---

<sup>44</sup> 杭州將軍年羹堯，〈奏謝調補杭州將軍摺〉，雍正三年四月廿二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74。

<sup>45</sup> 參見馮爾康，《雍正傳》，頁112-113。

<sup>46</sup> 杭州將軍年羹堯，〈請假半年養病摺〉，雍正三年五月初六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74。

<sup>47</sup> 杭州將軍年羹堯，〈請假半年養病摺〉，雍正三年五月初六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74。

（年羹堯）問臣：「我的事，皇上曾有諭旨與你否？我們相與一場，你須實實告我。」臣答云：「並無諭旨。」年羹堯又云：「我將來身家性命是不能保的了！」遂哭泣不止。臣只得寬慰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罪調陞，將軍從此若能悔罪改過，諸事安靜，自然無事了。」彼云：「我還敢多事嗎？」<sup>48</sup>

對年羹堯而言，調離陝西，等同失去根基，恐怕凶多吉少，言語間頗為憂懼，亦有賭氣之意。自五月起，清世宗不斷發來官員的參奏，年羹堯秉持「臣之所無者，既得據實自陳；臣之所有者，亦已據實自認」原則逐條「剖辯」，<sup>49</sup>然皇帝胸有定見，其人誠惶誠恐的自白，亦無法讓皇帝回心轉意。

十月初四，清世宗命散秩大臣拉錫（?-1733）等赴杭州逮問，眾人詳細奏報當時的情況：

年羹堯毫無懼色，仍強辯道：「此事緣由，我前已奏聞，抑或日後可明」等語。我遂問之：「如果按爾抵賴所言，日後自有明日，難道是高其培、施義志編造者乎？」伊仍曰：「久後自明」等語。我遂謂曰：「年羹堯，爾戾諸多，尚不認錯，反而強橫乖張，囂凌狂傲，爾何以如此猖狂！我清朝負恩朝臣遭貶似爾者，別無一人」等語。伊答曰：「如若那樣，我死期已至」等語。看上去實乃不知生死，

<sup>48</sup>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為遵旨回奏事〉，雍正三年六月廿六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第4冊，頁579。

<sup>49</sup> 杭州將軍年羹堯，〈奏辯范時捷所參各款摺〉，雍正三年五月廿五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875。

狂妄可憎，不宜留世者也。遂將年羹堯鎖拿。……年羹堯被鎖拿之時，毫不在乎，反呵斥隨身諸子曰：「爾等毋懼！」每日與看守官兵隨便說笑。<sup>50</sup>

年羹堯雖具摺悔過，摺中有「臣今日一萬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饒了臣」等語，<sup>51</sup>對其他官員卻非但不願認罪，態度還「囂凌狂傲」，呈現出相互矛盾的形象，猶如年羹堯在勢盛時期，即帶有一種「兩面性」：向皇帝奏對則恭謹謙卑，與他人相處則逞其驕志，無怪乎待得入京陛見，皇帝眼見為憑，方才識破想像與現實的落差。

同樣面對奉命而來的官員，年羹堯的態度亦有不同。五月會見岳鍾琪，尚且「哭泣不止」、心中有所期盼，因當時雖遭降職，仍屬官員的調任；此刻卻要鎖拿，身分已成罪犯。依年羹堯對拉錫等人態度推斷，可能一來自知無望，二來性情狂傲，認為諸臣並無資格將其逮問，故心態強橫，甚至生死置之度外，使原為負面的「狂妄可憎」等描述，反而成就一派英雄氣概，實非記述者本意，更非皇帝所樂見。

## （二）官員的參奏

雍正三年五月開始，許多官員因懼遭牽連，極力撇清與年羹堯的關係，如兵部尚書李維鈞(?-1727)奏稱：「臣遂與年羹堯相絕，並無一字跡來往。」<sup>52</sup>李維鈞早在雍正三年二月初，便奏請將隆科

<sup>50</sup> 散秩大臣拉錫等，〈奏報密捕年羹堯及清查家產摺〉，雍正三年十月初四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上冊，頁1222-1223。

<sup>51</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附編，頁852。

<sup>52</sup>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維鈞，〈奏為奏明事〉，雍正三年五月初一日。

多(?-1728)、年羹堯「二人之黨以漸而散，二人之權以漸而輕」，<sup>53</sup>但其人實非年羹堯政敵。李維鈞曾對年羹堯「跪道迎接」，年羹堯還欲推薦李維鈞為巡撫，<sup>54</sup>兩人本屬同黨。正因害怕這層關係導致禍及己身，李維鈞迅速見風轉舵，與年羹堯劃清界線。另如浙江巡撫法海(?-1737)從前曾對年羹堯「敬禮之」，此時卻聲稱：「臣與年羹堯雖俱是進士出身，素未嘗相往來」，<sup>55</sup>並辯解：

彼時臣見年羹堯居心行事，似乎一團忠氣，故敬禮之，敬大臣乃所以尊朝廷也。今年羹堯之居心行事狂妄已極，復蒙皇上寬恩宥罪，仍予以自新之路。<sup>56</sup>

多數官員力圖自保，不願與年羹堯有任何牽連，然岳鍾琪注意到，年羹堯離開西安時，尚有數十人相送。<sup>57</sup>而在朝中，年羹堯雖成眾矢之的，也仍存有相對緩和、被認為刻意偏袒的觀點。

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冊，頁237。

<sup>53</sup>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維鈞，〈奏為敬抒愚悃仰祈聖鑒事〉，雍正三年二月初一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第3冊，頁782。

<sup>54</sup> 「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接，受之不辭」與「欲薦李維鈞為巡撫」俱在後來年羹堯九十二條大罪之列。見《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第1冊，卷39，頁572、574，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甲戌條。

<sup>55</sup> 浙江巡撫法海，〈奏臣伏讀硃批年羹堯諭旨〉，雍正三年五月廿八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冊，頁430。

<sup>56</sup> 浙江巡撫法海，〈奏臣伏讀硃批年羹堯諭旨〉，雍正三年五月廿八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冊，頁430。

<sup>57</sup> 川陝總督岳鍾琪，〈為欽奉上諭事〉，雍正三年五月廿六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冊，頁441。岳鍾琪認為送行者皆為「平日得年羹堯資財之人」，但年羹堯已自身難保，若僅是從前因利益關係依附的黨羽，豈會冒大不韙來為其送行？此事或可說明年羹堯在川陝聲勢仍盛，且平時頗得人心。

隆科多在議罪之際，出言袒護年羹堯，<sup>58</sup>遭清世宗訓斥，甚至「下都察院議罪，隆科多坐是削太保銜，解（吏）部務」。<sup>59</sup>朝中風向如何，曾秉承清聖祖顧命、縱橫官場多年的隆科多不可能看不出。前引李維鈞奏摺，便將隆科多、年羹堯二人並稱，或許此時隆科多從年羹堯案中，隱約預見自己的下場，頓生唇亡齒寒之憂，故有偏袒之意，然已勢不可為。

官員撇清與年羹堯的關係，更要加以參奏，眾人論述模式頗為相似，主要有三項要點：

其一，清世宗並非識人不明。年羹堯從前盡忠職守，故得到皇帝器重。<sup>60</sup>

其二，清世宗並非構陷功臣。年羹堯雖有功，但「自西海功成而後，忽爾恣肆驕縱，諸事疏慢不敬，頗異夙昔」，<sup>61</sup>與以往判若兩人，其「居心做人竟至如此，種種背負君恩，為天下所唾罵，臣工所切齒」，<sup>62</sup>自取敗亡，理應嚴懲。

其三，年羹堯大逆當斬。朝臣議論最終結果，即是十二月議政大臣、三法司等議定的九十二條大罪。<sup>63</sup>年羹堯「反逆不道，欺

---

<sup>58</sup> 福格《聽雨叢談》載：「首發年羹堯之僭妄者，為漢軍蔡珽，而袒年者為隆科多。」見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3，〈漢軍迴避刑部〉，頁53。

<sup>59</sup> 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第4冊，卷32，〈年羹堯列傳〉，頁793。

<sup>60</sup> 「在昔，年羹堯凡奉皇上委辦一切軍務，無不盡心竭力，敬謹辦理，我皇上因念其體國之勤勞，所以寵任不疑。」見河南河北總兵官紀成斌，〈奏為遵旨回奏事〉，雍正三年五月廿二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冊，頁376-377。

<sup>61</sup> 河南河北總兵官紀成斌，〈奏為遵旨回奏事〉，雍正三年五月廿二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冊，頁377。

<sup>62</sup> 四川巡撫王景灝，〈為欽承訓旨瀝陳悃誠仰祈睿鑒事〉，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4冊，頁835。

<sup>63</sup> 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瀆

罔貪殘，罪跡昭彰，彈奏交至，案牘等邱山之積，罪惡踰溪壑之深」，<sup>64</sup>應以大不敬斬立決。

### （三）清世宗的決斷

年羹堯本人及其他朝臣發表的看法，其實都受清世宗影響，甚至可說圍繞皇帝的觀點而展開。年羹堯為求保全，事事屈從皇帝；眾臣則判定皇帝心意已決，年羹堯亦無反撲可能，因而大書其罪，全無褒揚、求情，呈現一面倒之勢。雍正三年五月至十月，是官員參奏的顛峰期，清世宗也在上諭當中，頻繁提及年羹堯之罪，應不是偶然。

五月廿二日，諭曰：

朕御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以心膂，豪無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效。孰知朕視為一德，伊等竟懷二心；朕予以寵榮，伊等乃倖為邀結。

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幾致陷朕於不明。朕深恨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sup>65</sup>

清世宗自責信任太過，念其青海之功，心懷不忍，甚至看到朝臣議定的九十二條罪狀時，竟不禁墮淚。年羹堯議罪，本由皇帝授

---

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共九十二條罪狀。見《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第1冊，卷39，頁571-574。

<sup>64</sup>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第1冊，卷39，頁571，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甲戌條。

<sup>65</sup>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第1冊，卷32，頁488-489，雍正三年乙巳五月己未條。

意，是皇帝本人主導的懲辦，清世宗卻不希望自己呈現出乾綱獨斷的鐵面形象，極力加以粉飾。

在這個事件中，清世宗與年羹堯的形象是相對的。年羹堯被賜死，他與皇帝之間，必定一是一非。年羹堯曾為清世宗推崇備至的心腹重臣，此時若想歸罪其身，則需要一些論述策略。

清世宗的說法中，包含許多情感與自責的成分，並非一味貶斥年羹堯，不僅未處極刑，又赦免其親族多人死罪。實際上，清世宗是反其道而行，透過自責、自咎，深刻的反省與情感流露，更襯托出年羹堯「背負君恩」的負面形象。清世宗慨嘆：「朕之恩，尚忍負乎？」<sup>66</sup>一個「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負」的「逆臣」，再無轉圜餘地；而清世宗反躬深省、處置寬仁，無損於聖德。

年羹堯之後，清世宗很快開始處理其他政敵。雍正四年（1726）六月，有官員查出塞思黑（允禩，1683-1726）曾與年羹堯以祕密文書往來，欲告發塞思黑圖謀不軌。<sup>67</sup>年羹堯成為擅權叛逆的代名詞，和他相提並論的塞思黑、隆科多等人，最後都遭到整肅。

## 四、千秋功過：流傳中的清世宗與年羹堯

據說雍正三年十月，清世宗雖下令將年羹堯解京，本想寬宥，某日有野虎闖入年羹堯家中，遭九門提督率侍衛擊斃，清世宗認為是「天意當誅」。<sup>68</sup>年羹堯傳奇一生，風雲叱吒，結局卻帶有幾

<sup>6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64，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諭年羹堯。

<sup>67</sup> 總督管理直隸巡撫事務李紱，〈奏為據實奏明不軌情形仰祈睿鑒敕部嚴究事〉，雍正四年六月廿三日。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下冊，頁1125。

<sup>68</sup> 「戊辰，野虎入年羹堯家。虎由西便門進正陽門西江米巷，入年羹堯舊宅，咬

分宿命的無奈。

從知遇榜樣到背負君恩，清世宗以皇帝之尊主導評價的走向，年羹堯似無還手之力。但即使年羹堯已遭正法，民間猶有異說，未必盡如皇帝所述。至百餘年後，當大清皇權已岌岌可危，清世宗與年羹堯君臣形象隨著時局變化，更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發展。

### （一）官方說法

雍正四年三、四月之交，侍講學士錢名世因曾對年羹堯歌功頌德，遭革職議罪。清世宗斥其為「名教罪人」，命官員群起作詩痛責。<sup>69</sup>官員詩作除譏諷錢名世阿諛奉承，連帶指斥年羹堯謀逆之罪。如欽天監曆科博士孟泰巖詩云：「罔顧清操全學術，惟知讒諂媚權奸」，<sup>70</sup>檢討候補刑部郎中李根雲詩云：「讀書空自盈千卷，頌逆猶稱第二碑」，<sup>71</sup>總歸一句：「不知大義在君臣」。<sup>72</sup>年羹堯是「權奸」、「逆臣」，不知君臣之義，往後官方對年羹堯的定位大抵如此。

官方記載多引上諭、奏摺，承繼皇帝的說法，如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諭明言：

---

傷數人。九門提督率侍衛鎗斃之。上降諭：朕將年羹堯解京，本欲仍加寬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當誅。將虎仍還伊家。相傳羹堯生時有白虎之兆。都城人煙稠密，環衛森嚴，竟無人見虎所由來，亦非偶然矣。」見蕭爽，《永憲錄》，卷3，頁238-239。

<sup>69</sup> 「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為詩文紀其劣跡，以儆頑邪。」見《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第1冊，卷42，頁631，雍正四年丙午三月壬戌條。

<sup>70</sup> 《名教罪人》，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清代詩文總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據雍正四年內府朱墨套印本影印），第645冊，頁296。

<sup>71</sup> 《名教罪人》，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清代詩文總集》，第645冊，頁304。

<sup>72</sup> 禮部主事朱謨作，見《名教罪人》，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清代詩文總集》，第645冊，頁316。

年羹堯不臣之心顯然，但因喪心病狂，昏憤顛倒之所致。  
鄒魯乃無知小人，相與謀逆之情雖實，而事蹟尚未昭著，  
朕念年羹堯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極刑。<sup>73</sup>

官方記載認定年羹堯謀逆屬實，而皇帝已經從寬處置，是「委曲  
矜全，莫大之恩」、「格外恩眷之意」。<sup>74</sup>至雍正六年（1728）曾靜  
（1679-1736）案時，清世宗發覺民間竟有流言疑其「誅忠」，特撰《大  
義覺迷錄》加以辯駁：

年羹堯受皇考及朕深恩，忍於背負，胸懷不軌，幾欲叛逆。  
其貪酷狂肆之罪，經大臣等參奏九十二條，揆以國法，應  
置極刑，而朕猶念其西藏、青海之功，從寬令其自盡，其  
父兄俱未處分，其子之發遣遠方者，今已開恩赦回矣。<sup>75</sup>

藉此強調「並未誅戮忠良之大臣」。<sup>76</sup>

民國以後，代表清朝官方立場的《清史稿》，將隆科多、年羹  
堯合為一傳，傳後論贊曰：

雍正初，隆科多以貴戚，年羹堯以戰多，內外夾輔為重臣。  
乃不旋踵，幽囚誅夷，亡也忽諸。當其貴盛侈汰，隆科多  
恃元舅之親，受顧命之重；羹堯自代允禔為大將軍，師所

<sup>7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第6冊，頁251，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刑部等衙門請將年羹堯照謀反律正法奉上諭。

<sup>74</sup> 〈大臣畫一傳檔正編·年羹堯列傳〉，收入清國史館編，《清國史》，第6冊，卷96，頁155。

<sup>75</sup> 清世宗，《大義覺迷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1，頁66-67。

<sup>76</sup> 清世宗，《大義覺迷錄》，卷1，頁70-71。

向有功，方且憑藉權勢，無復顧忌，即於覆滅而不自恤。  
臣罔作威福，古聖所誡，可不謹歟！<sup>77</sup>

此段評論將年羹堯之死歸咎於其身為人臣，卻擅權僭越，自取敗亡，如同清世祖《御定人臣儆心錄》所謂「負主恩而渝素志，至於身罹刑憲，悔悼無由」的看法已成定論。<sup>78</sup>

## （二）野史傳聞

年羹堯與皇帝關係密切，曾位極人臣，後遭議罪致死，經歷本屬非凡之奇；在野史中，更被懷疑攸關清世宗奪位祕辛，備受後世議論紛紜。野史傳聞述及年羹堯，時常突顯以下四個面向：

### 1. 掌握重兵，聲勢壯盛

如晚清章回小說《兒女英雄傳》中，有位平定青海的大將軍紀獻唐，漢軍人氏，其父紀延壽，分明影射年羹堯及其父年遐齡（1643-1727）。紀獻唐帳下有「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自恃功高，圖謀不軌，被參九十二條重罪，詔令自盡。<sup>79</sup>這個隱晦的年羹堯，與清世宗塑造的形象較為相近。

### 2. 性情嚴酷，鐵令如山

據民初裘毓慶《清代軼聞》所記，年羹堯某日乘輿，從官扶輿而行，年羹堯見天寒地凍，便對從官說「去手」，讓眾人將手收起，以免凍僵，結果從官誤解語意，竟二話不說，各出佩刀，自

<sup>77</sup> 趙爾巽，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9），卷302，〈隆科多、年羹堯傳〉，頁8905。

<sup>78</sup> 王永吉奉敕編，《御定人臣儆心錄》，〈御製序〉，頁1-2。

<sup>79</sup> 文康，《兒女英雄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8回，〈假西賓高談紀府案，真孝女快慰兩親靈〉，頁538-549。

斷其手。<sup>80</sup>另如《棲霞閣野乘·年大將軍延師》，年羹堯聘請一位江南儒者教其子，儒者戰戰兢兢，果見年府之內規矩森嚴，有如軍旅，屬下、僕從稍有差錯，立遭「獻首階前」，年羹堯猶在旁談笑自若。<sup>81</sup>此類故事著重表現年羹堯平時治事嚴酷，毫無情面，令人敬畏有加，對其任何命令皆不敢絲毫懷疑。

### 3. 囂張跋扈，無人臣禮

此類內容頗多，如乾隆年間成書的《永憲錄》，記載占象人鄒魯與靜一法師為年羹堯卜卦，算出將成帝業，年羹堯本人也大言不慚。<sup>82</sup>關於年羹堯是否有篡位野心，昭槤（1766-1829）《嘯亭雜錄》記載的過程更加曲折：

（年羹堯）至御前，箕坐無人臣禮，上皆優容之，而年猶不悟。……幕客有勸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觀天象，浩然長嘆曰：「事不諧矣！」始改就臣節。其降為杭州駐防防禦時，日坐湧金門側，鬻薪賣菜者皆不敢出其門，曰：「年大將軍在也。」其餘威尚如此，實近日勳臣所未有也。<sup>83</sup>

<sup>80</sup> 裘毓慶，《清代軼聞》（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9，據民國十七年鉛印本影印），卷1，〈年羹堯軼事一〉，頁12。

<sup>81</sup>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卷下，〈年大將軍延師〉，頁107-112。

<sup>82</sup> 「據鄒魯供：做皇帝的話，原是年羹堯想做皇帝。把讖語與靜一道人的說話講過，即問小的：『你看我數如何？』小的對他說：『果然要做皇帝。』再去年六月內年羹堯半夜起來，叫小的同看他住房上的白氣，他說是王氣。小的問他：『如何是王氣？』他說大凡白氣皆是王氣，又說他生時金光滿室，也是一件奇事。又說依各種道理看來，明年三四月京師定然有事，隨即南邊亦有事，後來西安亦難平定。『我有川陝之權，牢不可破，誰人敢當？』」見蕭爽，《永憲錄》，頁246-247。

<sup>83</sup>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9，〈年羹堯之驕〉，頁272-273。

這段記載整體情節不置褒貶，有如俠義小說，寫出睥睨世俗的英雄氣概，添加了不少想像成分。

又如《清宮十三朝演義》描寫年羹堯的軍隊竟不遵聖旨，只聽年羹堯號令，清世宗見狀心想：

這還了得，他倘然一旦變起心來，朕的性命，豈不是在他手掌之中麼？皇帝心中十分懊惱，年羹堯心中卻十分得意。他奏說道：軍中祇知有軍令，不知有皇命。還請陛下明鑒。皇帝聽了這個話，心中越法不快，便也不做聲。年羹堯看看皇上的臉色不對，心中已有幾分明白，忙告辭回營。<sup>84</sup>

年羹堯掌握重兵，皇帝的顧忌可想而知。傳說中的年羹堯，還曾與「自古僭越之臣」曹操（155-220）、司馬昭（211-265）相提並論，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傑黠陰鷙」的清世宗當然無法容忍，因而招致禍端。<sup>85</sup>其實年羹堯終其一生，權勢從未到達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程度，只是人們對於奇聞異事往往十分熱衷，情節構思愈發曲折離奇，年羹堯的形象因此趨近於皇帝，權威甚至凌駕皇帝之上。

#### 4. 雍正篡位，年、隆主持

「雍正篡位」，當為清世宗最深惡痛絕的說法，卻在後世廣為流傳。清世宗曾重用又賜死年羹堯，是因為年羹堯擅權叛逆，還是想殺人滅口？清世宗是否經由篡位奪國，學界尚無定論，野史

<sup>84</sup>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上海：新華書局，1948），第3冊，卷3，第34回，〈牛鬼蛇神雍和宮，鶯燕叱咤將軍帳〉，頁16。

<sup>85</sup>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上冊，卷1，〈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頁26。

更傳得沸沸揚揚，如〈年羹堯擁立世宗功〉提及：

當世宗繼承之際，其陰謀祕事，想必不可為外人道者。而年、隆必參與其中祕密焉。觀世宗立後，諸王心多憤懣，累起反抗。年、隆二人，前蒙奇遇，後遭嚴譴，其故可深長思矣。<sup>86</sup>

許嘯天（1886-1946）《清宮十三朝演義》亦用「鳥盡弓藏」四字形容年羹堯之死。<sup>87</sup>在此論述脈絡之下，年、隆二人掌握太多內情，無論如何，必遭清世宗懲治，其為人是否囂張跋扈，並非主要致禍原因。清世宗被視為一個叛逆的篡位者，後又過河拆橋，誅殺功臣，諸多罪惡集中到清世宗身上，年羹堯、隆科多反而成為含冤受害的配角。

野史甚至記載年羹堯實為清世宗生父，雖無憑據，<sup>88</sup>此種刻意附會呂不韋（前292-前235）與嬴政（前259-前210，前247-前210在位）關係的故事結構，顯示年羹堯權傾朝野的形象深入人心，最後下場也如呂不韋一般，與君權產生矛盾而遭翦除。

清世宗觀點下的年羹堯形象恃功而驕，擅權妄為，並且最重

---

<sup>86</sup>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上冊，卷1，〈年羹堯擁立世宗功〉，頁27。

<sup>87</sup>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3冊，卷3，第35回，〈鳥盡弓藏將軍滅族，妻離子散國舅遭殃〉，頁21-32。

<sup>88</sup> 如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宮闈秘史》記載坊間此類傳聞：「蓋世宗之母，先私於羹堯。入宮八月，而生世宗。至是，乃竊詔改篡，令為天下主。故當雍正時代，羹堯權傾朝右，而卒以罪誅，說者比之呂不韋。」見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宮闈秘史》（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49。清世宗實較年羹堯年長，不可能為其子，相關考證詳見楊啟樵，〈清世宗與年羹堯的恩怨轆轤〉，收入楊啟樵，《清世宗及其密摺制度研究》，頁71-72。

要的：圖謀不軌，自取敗亡。縱觀上述野史傳聞，這樣的形象被流傳下來，加以誇大渲染，但是「咎由自取」的成分遭到削弱，年羹堯個人的傳奇色彩則備受關注與強調。

年羹堯在故事的結尾，時常表現出悲劇英雄的風範。如〈年大將軍延師〉描寫年羹堯遭革職拿問，先前聘請之儒師賄賂守衛，設法見到年羹堯，一時悲從中來，「撫大將軍而泣」，<sup>89</sup>年羹堯則笑曰：

大丈夫視死如歸，予即不法，實無悖逆。第上怒不解，予固不望生還。況予以儒生起家，權勢傾百僚，享用逾萬乘，得無盈滿之誅乎？<sup>90</sup>

這樣的年羹堯，即便軍法嚴峻、性情殘酷，但處變從容、威儀凜然，整體形象仍屬於正面角色。

據《清代軼聞》記載，年羹堯行軍途中，屢次運籌帷幄，能洞燭機先，決勝千里之外，足見「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為一時名將，而卒罹大譴，惜哉！」<sup>91</sup>在清世宗形象陰狠刻毒、偏向負面的清末民初，卻有人對年羹堯深懷惋惜，應是清世宗始料未及的。身為皇帝，清世宗能懲辦年羹堯或任何一名官員、親貴，能主導正史的評價，野史傳聞的流變則未必如其所願。

<sup>89</sup>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下，〈年大將軍延師〉，頁111。

<sup>90</sup>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下，〈年大將軍延師〉，頁111-112。

<sup>91</sup> 裘毓慶，《清代軼聞》，卷1，〈年羹堯軼事二〉，頁12-13。故事源頭與評價或出自陳康祺《郎潛紀聞》，「年雖跋扈不臣，罹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然「惜哉」二字感嘆為裘毓慶所加。參考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下冊，卷4，〈年羹堯之兵法〉，頁398。

## 五、結語

本文圍繞清世宗與年羹堯君臣的形象，討論盛清時期皇權框架之下，皇帝與權臣關係可能的波動向度。

「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sup>92</sup>為年羹堯九十二條大罪之首，無論年羹堯是否意圖謀反，既定此罪，代表其人才能、權勢與性格被視為具備謀反的條件，足夠對皇權構成威脅。

與野史中軍令凌駕皇命的年羹堯相較，真實年羹堯所造成的威脅，始終屬於潛在的形式，而非時時鋒芒畢露。即便在年羹堯勢盛時期，君臣形象的建構仍由清世宗完成，年羹堯從未掌握主動。經科舉步入仕途，後文轉武職，蒙皇帝不次拔擢的年羹堯，再如何權傾一時，奏摺行文猶必須謙恭謹慎，遵循皇權加於人臣的規範。

清世宗上諭有言：

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sup>93</sup>

清世宗的意思很明顯，人主所與者，人主亦能奪之，若非皇帝賞識重用，年羹堯何來青海軍功。皇帝的態度更左右朝廷輿論，嚴格限制權臣的勢力發展。

年羹堯身處邊疆，畢竟天高皇帝遠，與清世宗透過奏摺往來，

---

<sup>92</sup>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第1冊，卷39，頁572，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甲戌條。

<sup>9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第1冊，頁119，雍正三年三月廿三日，川陝總督年羹堯兩江總督查弼納署理江寧巡撫何天培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各具本奏賀奉。上諭。

維持一段清世宗認可且極力營造的「君明臣賢」理想狀態，也是在此種庇護之下，年羹堯得以走到當時皇權框架所能容忍的極限。當年羹堯入京陛見，清世宗隨即由種種跡象看清「君明臣賢」不過是種一廂情願的想像，年羹堯操持權柄，引發皇帝顧忌，於是清世宗為行整肅，親手打破「知遇榜樣」君臣佳話，以年羹堯的「背負君恩」取而代之，使懲辦之舉名正言順，君臣形象迅速經歷第一次劇變。

野史傳聞中，權臣威脅皇權的程度，比真實情況大得多。年羹堯可以幫助清世宗篡位，可以是清世宗生父，可以自行決定要稱帝或臣服，甚至可以是反清復明的俠客。<sup>94</sup>清世宗與年羹堯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君臣的形象如何再次經歷劇變。各種曲折離奇、經過渲染穿插的小說情節，固然只是人們的想像，卻有個共通點：不盡信皇帝所主導的官方說法，懷疑其中必有隱情。對年羹堯的惋惜與嘆服、清世宗為遮掩篡位之實而殺功臣滅口等等，無疑與清世宗「背負君恩」的觀點背道而馳。

清世宗身為皇帝，不僅權勢獨尊，生殺予奪，更意圖主導君臣形象的建構，使一位趨近完美的明君與一個叛逆不法的罪臣長存史冊。在官方記載裡，皇帝似乎大獲全勝；野史中的形象流變卻眾口紛紜，不斷挑戰皇帝的權威。至今，野史戲說層出不窮，清世宗終究無法盡遂其所願。

---

<sup>94</sup> 見吳鳴，〈在正史與野史之間：《年羹堯新傳》導讀〉：「年羹堯雖為雍正奪嫡的功臣，但他的勢力卻不斷地被瓦解，血滴子（按：清世宗的情報組織）舊人亦多被替換，最後雍正乃將年羹堯貶為杭州城守，並欲藉此對付反清勢力，而年羹堯卻因不願犧牲江南群俠，乃一人做事一人當，終不免懸樑自盡。」收入成鐵吾，《年羹堯新傳》（臺北：遠流出版社，1993），第1冊，頁13。年羹堯在本書中是一位俠義的英雄，作者卷末以「成仁取義」許之。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資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摺專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

### 二、官書典籍

《大清世祖章（順治）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4。

《名教罪人》，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清代詩文總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5。

王永吉奉敕編，《御定人臣儆心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文康，《兒女英雄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成鐵吾，《年羹堯新傳》，臺北：遠流出版社，1993。

汪景祺，《西征隨筆》，收入故宮博物院掌故部編，《掌故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清世宗，《大義覺迷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清國史館編，《清國史》，嘉業堂鈔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國史館編，《滿名臣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上海：新華書局，1948。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裘毓麐，《清代軼聞》，臺北：臺灣華文書局，1969。

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趙爾巽，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9。

鄭玄注，孔穎達疏，阮元校，《禮記正義》，收入阮元校，《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燕北老人，《清代十三朝宮闈秘史》，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蕭爽，《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三、近人論著

馮爾康，《雍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楊啟樵，〈清世宗與年羹堯的恩怨轆轤〉，收入楊啟樵，《清世宗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陳捷先，〈年羹堯死因探微〉，《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975 年第 2 期，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頁 109-121。

